

安史之乱前入华粟特人在西域河西的农牧业生产

王晓晖

(河西学院历史系, 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 中亚粟特人大量移居中国后, 并不是全部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居住在西域地区和河西走廊的粟特移民, 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农业种植, 承担政府的赋役, 还进行畜牧业生产, 在安史之乱以前, 这些粟特居民的农牧业活动充分反映出入华粟特移民生产生活的多样性, 安史之乱以后, 粟特居民所从事的农牧业活动也已经与当地社会经济融为一体。

关键词: 粟特; 河西西域; 农业生产; 畜牧业

中图分类号: K2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520 (2008) 01 — 0022 — 05

粟特人, 即中国古代史书中所称的昭武九姓, 九姓胡、粟特胡等等。他们原本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唐称“那密水”), 即所谓的粟特地区(Sogdiana, 索格底亚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曾经形成一些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 如康国、安国、曹国、米国、何国、史国、石国、东曹国、西曹国等。汉唐之间, 由于经商和战争等原因, 粟特人大批移居中国。移居中国的粟特人往往以国为姓, 在西域、河西、乃至中原各地, 出现大量的以康、安、曹、史、石、何、米等为姓氏的粟特居民。

长期以来, 中外学者们对入华粟特人和粟特聚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族辨别、商业贸易、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文化传播、聚落的分布以及个别姓氏或某一地区聚落的形成演变等方面。^①对于粟特人的农牧业经营的情况, 研究极少。《大唐西域记》载:“窣利(粟特)……服毡褐, 衣皮氍, 裳服褊急, 齐发露顶, 或总剪剃, 彩络额。形容伟大, 志性恒怯。风俗浇讹, 大抵贪求, 父子计利, 财多为贵, 良贱无差。虽富巨万, 服食粗弊, 力田逐利者杂半矣。”^①这段材料充分反映了粟特人的外貌、服饰、性情特点, 更反映出其经商逐利的特点, 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其“服毡褐, 衣皮氍”、“力田逐利者杂半”的农牧业生产的特点。移居中原以后, 在农牧业方面, 粟特人继续保留着这方面的传统, 而对其农牧业的经营, 至今尚未看到专门的研究。

之所以将时间定在安史之乱以前, 是因为在安史之乱后, 粟特人在西域及内地的地位和生产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与前大不相同,^②尤其是其生产生活汉化程度日深, 已经失去了探讨的意义。本文试结合史书和考古材料, 对安史之乱以前粟特人的两个主要聚居区——西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生产进行考察, 以增强对入华粟特人的全面了解。

一、农业生产

西域地区是粟特人入华后首先到达的地区, 据荣新江先生的研究, 西域的据史德、龟兹、焉耆、高昌、伊州、于阗、且末、鄯善(石城镇)等, 都有粟特人。从三世纪开始, 在上述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粟特人的聚落。楼兰出土的一件汉文木简上, 记有建兴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楼兰地区粟特人的帐目。足见当时楼兰地区已经有粟特人居住了。而且从帐目一万石的数量来看, 当地居住的人数应当不少。^②

高昌地区的粟特人, 据安乐城出土的《金光明经》卷2题记上胡天的记载, 可知粟特人在5世纪前半叶即已进入高昌, 其聚落的位置可能是在高昌故城东部。新近在高昌故城外东北方向的巴达木乡, 发现了一处墓地, 出土有延昌十四年(574)的《康虏奴及妻竺氏墓表》和延寿七年(630年)《康浮面墓志》表明在墓地附近, 应当有一个粟特人聚落。^③而粟特人在向中国移民的过程中, 逐渐的流向了农业, 5到8世纪的文字记载揭示了当地粟特人相当一部分是农民。^④

唐灭高昌建立西州后, 在西州推行均田制, 每户按照人口的多少和等级授予田地, 如果户内人口有变动, 则相应的加减或收回土地。在均田制下, 西域粟特人受到和汉人一样的待遇, 当地的粟特人部分被编入户籍, 而且主要集中在西州高昌县崇化乡安乐里。^⑤由于被编入乡里, 这些粟特人就以农业生产为主。与周围的汉族百姓一起, 共同开发着西北边疆。

收稿日期: 2007-06-30

作者简介: 王晓晖(1971—), 男, 甘肃武威人, 河西学院历史系讲师, 主要从事敦煌吐鲁番学与西域史地的教学与研究。

根据姜伯勤先生的研究，西州粟特人聚落还有“归朝”即入籍粟特人与未入籍粟特人即“客胡”“兴胡”的区别。^[6]入籍粟特人往往是以农业生产为主。

吐鲁番所出《唐神龙三年（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集中的反映了粟特人在西域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残卷共存 97 行，其中存户主名 46 人，其中属昭武九姓者为 24 人，计：康姓 10，安姓 6，曹姓 4，何姓 2，石姓 2。其中属于典型的粟特名字的有：

安浮伽 康陀延 何莫潘 康迦卫 康那虔 何无贺伽
石浮伽盆 伽满 曹浮食 曹莫盆 康演潘

这 24 户粟特人都从唐政府受田，很明显，他们都是在从事农业生产。在高昌 / 西州的许多粟特人，可以作为田主，出佃田地，或者自佃耕种；也可以佃种别人的田地。这种现象在吐鲁番文书中十分普遍。通过对吐鲁番文书的简单梳理，还可以看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名，列表如下：^③

姓名	文书概名	出处（册一页）	备注
康秃子	丁口配田簿	6 — 366, 369	
康堆奴	丁口配田簿	6 — 366, 369	
康阿迴	丁口配田簿	6 — 366,	
康外何	点籍样	7 — 472	
康乌破门陀	授田簿	6 — 244、255、259	
康渠鼠	户簿帐	8 — 435	下下户
康阿蒲固	户簿帐	8 — 435	下下户
以上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			
康马居	户主别田籍	大谷 1204/1/22	户主
康伏食	佃人文书	大谷 1209/1/24	大女
康德正	佃人文书	大谷 1212/1/25	
康阿揽盆	佃人文书	大谷 1212/1/25	
康粟德	佃人文书	大谷 1213/1/25	
康道奴	佃人文书	大谷 1216/1/26	
曹定德	给田文书	大谷 1238/1/32	
曹阿金	经济文书	大谷 1304/1/45	三亩
曹伏你	户主别田籍	大谷 2360/1/84	户主
康复地	户主别田籍	大谷 2360/1/84	户主大女
康父师	佃人文书	大谷 2366/1/85	
石阿葛	佃人文书	大谷 2366/1/85	
康百海	佃人文书	大谷 2366/1/85	
康鼠子	佃人文书	大谷 2368/1/86	
康令子	佃人文书	大谷 2368/1/86	
何阿谷盆	佃人文书	大谷 2368/1/86	
安阿禄山	佃人文书	大谷 2368/1/86	
曹射毗	佃人文书	大谷 2373/1/88	
康伽尸毗	佃人文书	大谷 2373/1/88	
何浮伽毗	佃人文书	大谷 2373/1/88	
史阿堆	退田文书	大谷 2852/1/116	大女
康神奴	欠田文书	大谷 2886/1/126	
曹六六	欠田文书	大谷 2886/1/126	
曹实都	欠田文书	大谷 2886/1/126	
史莫延	欠田文书	大谷 2887/1/127	
曹胡胡	欠田文书	大谷 2887/1/127	
史赤奴	欠田文书	大谷 2887/1/127	
康石恚	户等簿	大谷 4152/2/208	下中户
安阿知浑	户等簿	大谷 4152/2/208	下上

何羌潘	户等簿	大谷 4152/2/208	中下
曹陲鸣	土地关系文书	大谷 4325/2/234	
安浮伽延	土地关系文书	大谷 4325/2/234	

（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法藏馆，1卷1983年，2卷1990年）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到，在西域地区，尤其是吐鲁番盆地，从高昌王国到西州时期，大量的粟特人从事农业生产，或成为高昌国的农民，或接受唐政府的授田，一些因为无地或地少而成为佃人，佃种汉人或者粟特人的土地。

另外，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时期的文书中，有一些涉及到农业水利事务管理的文书，其中有“堰头”一职，担任此职务的不乏九姓胡人，如：

天授二年	康文海	大谷文书 1258 号
匡（渠）	康毳子	大谷文书 2369 号
第十三堰	康力相	大谷文书 2374 号
□□渠第一堰	康何战	大谷文书 3372 号
（则天武后）	何后子	大谷文书 1047 号

每一个堰头所管的田地亩数大体为 30——60 亩。^[7]粟特人担任“堰头”，并且管理几十亩田地的水利、税务事务，充分反映出粟特人在经营农业生产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

进入河西地区的粟特人亦不在少数。

沙州与西域紧密相连，沙州敦煌县从化乡是一个粟特人聚落，池田温先生通过对 P.2657, P.3018, P.3559 和 P.2803 号文书的分析，并且结合日本学者对这些文书的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论述。据推算，敦煌县从化乡到 8 世纪中叶以前，大约有不到 300 户人家，1400 多口，是一个以粟特人为主的乡。农耕粟是该乡绝对不可忽视的一项生业。按照最保守的计算，每户平均要种植 10 亩以上粟田，此外，还种植麦、黍、豆、麻、蔬菜、瓜等作物，而且，在 8 世纪前半期内，该乡的农业出现了逐渐扩展的趋势。^[8]

凉州是粟特人在河西走廊上一个重要的聚居点。以安氏为首的中亚人在这数代经营，势力极大。武威七城之中，胡占其五，至德二年（757 年）河西兵马使盖庭伦，就是联合九姓胡人安门物的势力聚众 6 万，杀掉节度使周泌。而当吐蕃攻占河西，凉州胡人又曾组织九姓胡军以为自卫。^[9]如此众多的九姓胡人，不可能全部是在经商，其中一定有不少已经成为入籍编民而从事农牧业生产。凉州安氏后人李抱玉少长于西州，后善牧养名马，从军幕，成为李光弼的偏裨，并以平定安史之乱之功臣而赐姓李氏。

Дх.38206 + Дх.38516 + Дх.110686 写本为《开元廿三年张掖县户籍残卷》第四行有“曹致失鼻”，^[10]很显然，这是一个粟特人，而且也成为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唐朝编户农民。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仅有的关于唐代甘州的文书，其中的这一记载，已经向我们透出唐代甘州地区粟特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信息。

二、畜牧业经营

对于西域粟特人的畜牧业，由于西域地区从传统上来说就是一个农牧业发达的地区，粟特人肯定在这里有畜牧业经营。但是，具体的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材料较少。

敦煌遗书《沙州伊州地志》记：“石城镇，本汉楼兰国。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11]萨毗泽附近，应该是水草丰茂的地区，康艳典在此筑城，完全是因为此地适合发展农牧业，而且，这样一个聚族而居的粟特聚落，完全有理由认为其有大量的畜牧业存在。

有学者通过对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中关于饲马的西域胡人的容貌被称为“紫髯胡雏”，而认为“紫髯碧眼”正是指粟特昭武九姓马仆，大约应是康国人。而其饲养的桃花色马产自西域，这类马称为土库曼马或突厥斯坦马，其中最优良的品种主要栖息在威海、锡尔河以南或者阿姆河地区，而唐朝主要从粟特地区的康国引进。伴随西域康国良种马的引进，马鬃的修剪和式样也传入了中国，同样，这种昂贵马匹的饲养人——康国人，也伴随马匹进入西域从事养马业。^[12]另外，还有一些“来自中亚的俘虏，通常都从事牧马人、马夫以及贵族车仗的骑马侍从等职业。”^[13]这可能也是一些粟特人为唐朝人从事畜牧业的一个途径。

开元七年（719 年）以前，安忠敬“迁右威卫翊府中郎将兼新泉军使。进本卫中郎将、赤水军副使兼赤水、新泉两军监牧使。改会州刺史、营田使。”^[14]据《新唐书·兵志》记载，从贞观到麟德（627—665 年）唐朝先后养马达 706,000 匹，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为此唐政府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在中央设有太仆寺、驾部、尚乘局、闲厩使，地方设监苑，形成严密的监牧制度。此外，还设有监牧使、群牧使等专门的主管畜牧生产事务的使职。安忠敬身兼唐朝河西道赤水、新泉两军监牧使，担任专门主管畜牧业生产的使职，应该与他出身粟特家族有很大的关系。

南北朝以来，粟特各国时常向中原王朝进行朝贡，其中明确提到贡马事宜的，史书记载如下：^①

康国	武德七年—624年	《唐会要》卷99，1774页
	贞观元年—627年	《旧唐书·西戎传》
	开元十二年—724年	《册府元龟》卷971，5页
	天宝三载—744年	《册府元龟》卷971，14页
	天宝九载—750年	《册府元龟》卷971，17页
安国	贞观初—约627年	《新唐书·西域传》
	开元十四年—726年	《册府元龟》卷971，7页
	开元十五年—727年	《册府元龟》卷971，7页
	天宝九载—750年	《册府元龟》卷971，17页
石国	天宝五载—746年	《册府元龟》卷971，15页
	天宝六载—747年	《册府元龟》卷971，16页
曹国	天宝三载—744年	《册府元龟》卷971，14页
史国	天宝三载—744年	《册府元龟》卷971，14页
米国	天宝三载—744年	《册府元龟》卷971，14页

这种贡马往往会影响到粟特人在入华后的农牧业经营，因为他们熟悉中亚马匹的习性，所以这些马匹往往又会交给入华粟特人驯养。西域是最接近中亚的地区，在气候、自然条件等方面与中亚极为相似，粟特各国贡献的马匹，如果数目较多，肯定有不少会牧养在西域乃至河西地区，尤其是在唐代管辖西域后。同时，这种贡马不仅改良了中原的马匹，也丰富了入华粟特人的牧业生产。

三、结语

隋末唐初，移居伊州、鄯州一带的石、康两姓。他们不是在粟特人经商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聚落，而是在特定时期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群体性移民活动，由首领领导，聚族而居，并且建造城池。这样的聚落胡化程度最高，因为它是原生性的。^②那么，这样的聚落较多的保持着粟特人原来的生活生产方式，农业在他们的经济中不占主要的地位，只是较多的种植了中亚作物——葡萄。

河西走廊凉、甘、沙州和高昌/西州地区所居住的粟特人，经商的人不少。但是还有许多往往按照乡、里编籍，计口授田，如高昌县的崇化乡和敦煌县的从化乡，居于此地的粟特人，有许多从第一代就已经开始在这些地区从事农牧业的生产了。当地粟特人的农牧业的经营应该说已经纳入了唐朝全国经济体系当中。大量从事农牧业生产的粟特人像汉人一样承担各种赋役。如P.2803记载唐天宝九载九月，敦煌县从化乡的一些居民分别向郡仓交纳和粟（官买谷物），其中就有康揽延粟8硕、康令钦粟2硕、安守礼粟24硕、安沙德粟3硕8斗、安边廷24硕2斗、安守德8硕的记载，不论他们是自己种植还是作为地主从佃户那里收取谷物。西州的粟特人从事生产和承担赋役的情况从上述列表也可清晰的看到，因此很多粟特人都在直接或间接的经营农业生产。此外有的粟特人还担任里正一职。如李方先生关于高昌粟特人史玄政的论述，极为透彻。^③

对于入华粟特人，人们往往由于他们善于经商而在讨论时忽视其农牧业生产。其实，经商并不是全部粟特人的主要生业，对于大量的普通粟特移民，“其中间阶层的悬隔是很大的，既有身为唐的品官的有力者，又有多数贱民存在。”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入华粟特人中，一部分为经商者，一部分成为各级官吏，尤其成为主管畜牧业的官员是一个特色，如安忠敬。^④而大多数人总是与居住地的生活方式联系密切，在中国传统的农牧业区域，他们也以农牧业生产为主，并且使入华粟特人的经济活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安史之乱以前，入华粟特人从事农牧业的人口不断增加，与居住的生产方式的结合越来越密切，而这种生产方式与当地的结合，往往使粟特人较快的融入当地社会，加速了他们的汉化。

注：

①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为：桑原鹭藏《隋唐時代に支那に来往した西域人に就こ》，原载《内藤博士还历祝賀支那学论丛》，后收入《桑原鹭藏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1968年，270—360页。冯承钧《唐代华人化蕃胡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129—157页。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57年，1—154页。小野川秀美《河曲六胡州の沿革》，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亚人文学报》，1卷4号，1942年，194—226页。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汉化》，载《史学月刊》1994年1期，22—27页。前田正名著，陈俊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5—86页。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207—299页。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2期，78页。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157—172页。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302页。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

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1期，198 - 209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第35辑，1992年，122页；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3期，168 - 177页。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227 - 235。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法国汉学》丛书委员会编《粟特人在中国》，中华书局，2005年，208页）

②可参看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载《历史研究》，1996年2期，34页。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载《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2页；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192页。陈海涛《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5期。韩香《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载《民族研究》2000年3期，71页。刘惠琴、陈海涛《唐代入仕粟特人的汉化进程》，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期，215页。

③以下文书均在755年以前，统计以大谷文书为主，《吐鲁番出土文书》、《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三种书里关于粟特人的情况可参看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出版。陈海涛《从胡商到编民》，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九辑），2002年。大谷文书的标识指：文书编号/卷数/页数。

④据《魏书》、《北史》、《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唐会要》等记载，安史之乱以前，粟特各国向中原王朝“贡物”、“朝贡”、“献方物”、“朝贡方物”、“献物”次数繁多，有许多次没有明确提到贡马，或许是朝贡时没有马匹，或者是马匹的数目在贡物中数目较少，或者记载不全，所以，此处的统计以明确记载为主。但是，肯定的是，除了列举出来的以外，定会还有不少的贡马。

⑤在原州（今固原）地区，考古发现的一些粟特人墓碑明确记载了他们担任畜牧业官员的事迹，因本文主要探讨河西西域地区，兹不赘述。

参考文献：

- [1] 玄·辩机撰，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72。
- [2] 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J]。西域研究，1993（2）：11。
- [3] 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468。
- [4] 童丕。中国北方的粟特遗存[M]。中华书局，北京：2005。208。
- [5] 池田温。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について[A]。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栗原益南先生古稀纪念文集[C]。东京：东京汲古书院，1988，248-258页。
- [6]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54。
- [7] 周藤吉之。倭人文書の研究——唐代前期の倭人制[J]。西域文化研究（法藏馆），1959（2）（上）。
- [8] 池田。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A]。唐研究论文选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1。
- [9] 陆庆夫。丝绸之路史地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137。
- [10] 丘古耶夫斯基著，王克孝译。敦煌汉文文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2。
- [1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 [12] 谢建忠。试探岑参诗中的西域胡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1）63。
- [13] 谢弗（美国）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97。
- [14] 张说。河西节度副大使鄯州都督安公神道碑铭并序[A]。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3。2331。
- [15]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8。15。
- [16] 李方。唐西州九姓胡人生活状况一瞥——以史玄政为中心[A]。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C]。1999，265-285。

[责任编辑：朱耀善]